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5.018

# 东北抗日义勇军武器、军费来源问题考察

张万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东北抗日义勇军乃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民众自发组建起,但却能在一年内迅猛发展达三十多万人,其军需来源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重要问题。在无固定武器、军费援助的困境中,他们依靠自筹、缴获、外援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日斗争。由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援助方的内部局限性等几个方面的制约,影响了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援助,致使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需无法保障,成为义勇军解体的一个因素。

**[关键词]**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0)05-0133-07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民众纷纷揭竿而起,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对日的殊死斗争,显示出东北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强大力量。较有影响的辽宁有唐聚五、邓铁梅、张海天、郑桂林等部义勇军,吉林有李杜、冯占海、王德林等部义勇军,黑龙江有马占山、苏炳文、李海青等部义勇军。毋庸置疑,军队作战需要强大的军需做支撑、军费做保障,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亦是如此。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军需、经费来源问题,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东北民众救国会领导人阎宝航、王化一、郭景珊等在其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当时的报刊、著述等也有零星的叙述,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论述多集中于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暗中支持、抗日救亡团体及国内外民众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援、尤其是对马占山江桥抗战的援助等几个方面,鲜有学者对军需和经费等问题进行专门性的探讨。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考察,探求义勇军经济来源的几个途径,以此管窥东北抗日义勇军由兴起、发展到解体之原因,进而补充和丰富十四年抗战史研究之内容。

##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初建时之武器来源

东北抗日义勇军由东北军、旧军警、土匪、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等组成,冠名“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其中农民占50%,土匪占20%,旧军警占25%,知识分子、工人、商人占5%。民间所存枪支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创建时最大的武器来源。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曾在九一八事变前将沈阳库存的20万支枪发放给全省58个县公安大队,补充公安大队的军需,这为辽宁义勇军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初建时所持武器呈现多样化

由于义勇军成分复杂,其所持武器种类繁多。1.农民武装组建义勇军武器情况。辽东义勇军的王凤阁、王彤轩、梁锡夫部,辽北的栾法章等部义勇军都为农民武装,持有的多是土武器。普通农民参军的,有些人携带了土枪、老洋炮,而多数人手持棍棒、扎枪、锹镐。农民组成的义勇军几乎是以原始的武器对抗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关东军,甚至无枪者就持大刀或扎枪与敌肉搏。2.绿林武装武器装备尚可。

**[收稿日期]**2020-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国际价值研究”(15@ZH025)。

**[作者简介]**张万杰(1974-),女,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东北绿林武装众多,仅辽宁就有1500余支,10万余人。如辽南的张海天、顾冠军,辽西的高鹏振、刘纯启等部。他们在绿林时期持有的枪支弹药成为义勇军组建的重要基础,武器装备较好。3.地方民团、地主武装组建义勇军的武器装备良好。近代东北民众为了自卫,地方常常成立防匪、防盗、反侵略等性质的民团、联庄会等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此组建起一些抗日队伍。如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大地主谢文东等部。这部分义勇军的武器装备良好,在战场上有一定的杀伤力。4.由旧东北军警组建的义勇军都持有正规武器,装备比较齐整。如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冯占海、郑桂林、李纯华等部。马占山部誓师时军械尚称充足,有飞机、坦克,炮亦有数架。虽少重炮高射炮,但小枪支尚不缺乏。冯占海部约7万人,枪约5,7000支,每枪平均有子弹160发。王德林部枪支充足,略与人数相等,子弹每枪仅有30发。<sup>[2][21]</sup>此外,还有一部分伪军反正的义勇军,如项青山、唐聚五、李春润、刘景文等部,武器装备也较为齐全。

## (二)捐输成为获取武器和军需的一个重要途径

东北抗日义勇军自发而起,没有固定经费,一些义勇军首领不得不变卖家产购买武器,或作为活动费用。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李杜举旗抗日时就把私有财产、银行存款、面粉公司等捐出。辽宁义勇军第二军团代指挥李纯华、辽宁清原县孙铭武兄弟组建义勇军时,都变卖了房产、田地等,购买了武器弹药。与此同时,民众捐输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军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边道唐聚五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并成立了辽宁省政府,东边道各县人民踊跃捐输。桓仁县农务会长牛春宜捐高粱米1万斤,商务会长宋佐忱捐高粱米1万斤,白布20匹;桓仁镇上福记号马子金捐白布10匹;桓仁县江北烧锅经理王玉亭捐战马10匹,高粱5000斤;通化县烧锅经理严玉亭捐自养鹿300头。<sup>[2][21]</sup>义勇军将这些捐输用以购买武器,维持军需。

## 二、东北抗日义勇军自制武器、自筹军饷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初组建时,只是激于民族义愤,靠简陋的武器与敌人进行斗争。但若长期抵抗,必须设法解决军需问题。于是,一些义勇军设立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等,并在抗日游击区内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征收税赋、发行抗日货币等,以此收入来筹措军饷。

### (一)设立兵工厂,自制枪支弹药

为了解决武器问题,东北抗日义勇军招募工人,雇用技术人员,秘密开设兵工厂。规模较大的主要有黑龙江苏炳文部和辽南张海天部。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后,召集原沈阳兵工厂流亡的技工百余人,在博克图兵营秘密创办兵工厂,用洋灰、铁丝、炸药制造手榴弹、地雷等。张海天部义勇军在台安高力房村“乾元达”商号内设兵工厂,选用原沈阳兵工厂50余名技术工人,做出子弹、土手榴弹等。修械所内机床每天可修理枪支四五十支、制造子弹千余发。此外,项青山、吴三胜、李化一、王全一、唐聚五、黄锡山、李春润等部,在徐坨子、辽阳、沙岭、通化、本溪、新宾等处开设兵器修械所,相对条件简陋,但也能制作一些简单的武器。

### (二)在抗日根据地内发展生产,征收税赋

有些东北抗日义勇军选择地处偏僻的山区作为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以筹措军需、军费。李春润在新宾建立起抗日政府,采取保境安民的具体措施,由司令部贴出布告,号召大家各安生业,抓紧生产。他派员筹划军费,接收木奇的柜石哈达银矿,用银矿所得购买军需。他还接收新宾禁烟局,派出3个禁烟组下乡征收大烟税,3个组共征收数千两流通券,这些收入用来购买武器弹药。此外,义勇军在各自抗区内,一般向民众征收车辆税、大烟税、军粮等税赋,也有征收罚款的现象,如营口九龙的义勇军队伍,以治安为名向民众征收。

### (三)发行抗日货币

为解决军需开支问题,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队伍还发行了流通于各抗区之内的货币。据统计,东

北抗日义勇军货币共有 18 种名称,66 种面额版别,其中大部分是纸币,个别的为金属币<sup>[6]</sup>。货币以部队名义或是以抗区地方政府或民众团体名义发行,有的自行印制,有的利用旧的官银号钞票、有价凭证等改造或加盖印章而成。马占山、李杜、唐聚五、邓铁梅、刘景文、高文斌、李纯华、张海天、李春润等都发行了抗币,几乎遍及辽宁省 53 个县和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热河部分地区。其中以唐聚五部发行量最大、币值最高、流通最广。唐聚五在桓仁誓师后,被张学良委任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和辽宁省政府主席,队伍有十万之众。庞大的队伍靠税收、捐输很难维持,故唐聚五不仅设立兵工厂、被服厂,还设立民众银行,在通化等十余县流通。他以基金做保障,按照经济规律进行发行,在桓仁和通化两次发行近 800 万元,得到民众的认可。其中,一半费用作为军饷,一半给地方救济金融。总体来说,这些抗日货币发行 2 年多,物价保持稳定,既保证了军需,又促进了该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对军队的生存与巩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三、从战场及其他途径缴获战利品

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简陋的枪械、顽强的斗志对抗军备先进的日本关东军,其正义之举在组建义勇军之初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由此获得了不少战利品,主要有迫击炮、轻重机关枪、步枪、手枪,各种弹药、骡马及服装等,成为义勇军军需的重要来源之一。

义勇军靠简陋的武器仍能在战斗中缴获日军较为先进的武器等装备。1932 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阎宝航撰写的《东北义勇军概况》一文,对于义勇军缴获的战利品叙述较为详细。如 1931 年 12 月 15 日,辽西义勇军第四路耿继周率部在新民与日军激战,一次缴获步枪 67 支,机关枪 2 挺,子弹 5000 余发;1932 年 4 月 21 日,张维东、李春润、郭景珊、王彤轩各部义勇军在永陵地方与于芷山部伪军激战 4 昼夜,获步枪 216 支,机关枪 2 架。据《海城县志》统计,辽南义勇军自 1931 年 10 月兴起,到 1932 年末西征为止,“缴获步枪 3245 支,手枪 542 支,轻重机枪 121 挺,子弹 33 万余发,各种火炮 15 门,军马百余匹”<sup>[4][184]</sup>。这些缴获的武器成为东北义勇军军需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了战斗中缴获战利品满足军需外,东北义勇军还沿用绿林习俗“绑票”方式,以日伪人员为“人质”作为向日伪当局强索军需的条件。如 1931 年冬“绿林好”张文良部义勇军以旧堡福源海油坊日人经理做人质,最后日本人以金票 4 万元将人质赎回。抗日救国铁血军以满铁线辽阳驿机关主任铃木为人质,索要金票 20 万、机枪 50 支。据日本满铁总分部调查课 1932 年 8 月份日记记载,这个月义勇军在满铁沿线绑架人质达 75 名之多。<sup>[4][184]</sup>绑架这些人质给日伪当局以巨大压力,全部以军备或金钱作为赎回条件,进而补充了义勇军的军需和装备。

### 四、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给予的援助

义勇军在前方与敌搏斗,但械弹之补充,饷糈之筹措,均有赖于后方应援。为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些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和东北反满抗日协会,他们都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军需援助。

#### (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经济援助

1931 年 9 月 27 日,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等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将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将援助义勇军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在救国会成立时,张学良资助活动经费 30 万元。为鼓舞义勇军将士,张学良多次接见赴北平的各路义勇军司令或其代表,批现款、衣物、枪弹,然后由救国会将其分发给义勇军各部。江桥抗战后,张学良将 50 万元现款转交马占山,还亲批给辽南义勇军 3000 元。<sup>[5][57]</sup>1932 年 8 月 15 日,张学良派救国会人员将慰问金 1 万元给唐聚五部,还拨给唐聚五武器子弹 6 万发,大刀 750 把。<sup>[6][293]</sup>张学良的暗中援助,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精神上、物质上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救国会倡导国内外同胞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救国会常委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前往宁沪苏杭、甚至南洋等地发起对义勇军的募捐活动。经其不断的呼吁,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国民党何成浚部捐子弹10万发,朱庆澜捐助1万元。十九路军蔡廷锴允诺每月助5000元,并拨发子弹,<sup>[7]</sup>官兵踊跃捐款,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杜重远利用《生活周刊》刊登声援马占山江桥抗战的文章和募捐广告,仅1931年11月14日至1932年2月18日,《生活周刊》就收到上海各界捐款大洋129000余元,电汇给马占山部。<sup>[8]</sup>救国会还通过《大公报》登载募捐启事,截止到1932年1月11日,共收到捐款30121.32元,先后3次电汇马占山部军洋18000元。<sup>[9]</sup>据统计,救国会用社会各界捐助的大量现金支援义勇军,总金额达387000余元。

救国会通过发行爱国奖券筹措军费。救国会于1932年6月发行爱国奖券。同年8月10日,在北平中山公园当众开奖。至1933年4月救国会共发行爱国奖券6期,特种奖券1期,净收入17万元。除了三四千元救济东北失业青年外,其余都作为抗日义勇军的军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义勇军。张学良带头认购,东北军政人员、各界人士,甚至小商小贩、农夫也争先购买。

## (二) 后援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经费援助

1932年5月,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后改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简称后援会)。后援会成立后,广募义款,以充械弹之需。由于朱庆澜德高望重,他的倡议很快得到了海内外爱国同胞的响应,后援会由此得到了大量捐款。

后援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费进行援助。救国会对义勇军的经费支援以辽宁地区为主,而后援会则突破了这个限制,对东北三省甚至热河地区抗日义勇军都分别进行了援助。马占山、冯占海、苏炳文、李杜、丁超、王德林、朱霁青等部抗日义勇军都得到了后援会的经费援助。仅从成立到1932年底,后援会支援东北各义勇军达21.6万元。热河抗战前,后援会支援驻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拨发给马占山部的邓文、郇斌山、李海青部234509.3元,朱霁青部7241.91元,凌源锦西民众自卫团1000元,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彭振国部31386.6元等。<sup>[5][9]</sup>在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中,后援会拨发给东北各路义勇军77284元,其中朱霁青的东北国民救国军5000元,唐聚五部义勇军5000元,张海天部5000元,邓铁梅部1000元,王德林、孔宪荣部1500元。<sup>[10]</sup>

当时,在日本严格控制东北金融的状态下,将经费转交给义勇军并非易事。辽宁各部义勇军的款项,由后援会直接派人送到义勇军各部,或是通知义勇军各部到上海领取。对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经济援助,主要是通过哈尔滨市松江医院的车献之、余汝舟,以购药为名寄给他们,然后分送给黑龙江省各部义勇军。以同样方式,后援会将经费寄给吉林市世益堂药房的沈子振,由沈子振将收到的款项送给吉林各地义勇军。后援会第三次经费援助时,辽宁各部义勇军的援助由朱庆澜将军进行支配,对王德林、孔宪荣部义勇军的经费援助交给该军的军代表张楚玉、梁元善,对吉林其他各部义勇军援助交予军代表萧仙阁转交吉林省指挥部。

因为后援会与救国会职能相近,在援助义勇军及义勇军隶属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分歧。经过张学良及各界爱国人士出面斡旋,两会负责人逐渐消除分歧,共赴国难。1932年8月,后援会迁往北平。11月中旬,两会达成统一,进一步明晰两会职责:后援会专门募捐抗日资金,做支援义勇军的工作,而救国会则专门负责对日作战事宜。故后期义勇军的经费支持主要依靠后援会。《塘沽协定》签订后,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救国会和后援会遂宣告解体。

## (三) 东北协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经济援助

1933年2月,日军占领榆关,图谋华北,举国上下主张抗战的呼声高涨。为谋取长期抵抗之策略,国民党CC派齐世英等人在上海组织东北反满抗日协会(简称东北协会)总会,并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分会,继续接济东北抗日义勇军。救国会、后援会被取缔后,东北协会便自然担负起联络和支持义勇军的工作。此时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已经瓦解,辽东、辽西和热河境内还有一小部分坚持抵抗的义

义勇军,东北协会对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赵景龙等部义勇军进行联络、支援和委任等。李春润还被吸纳为东北协会北平分会的委员。

东北协会经费最初由上海市政府负担,后来改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发。《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方要求国民政府取缔一切抗日组织,于是国民政府逐渐减少甚至放弃对义勇军的支援。1933年7月27日,齐世英指示北平分会主任黄恒浩,称东北协会筹款艰难,将来必须结束接济义勇军。但黄恒浩认为,当此人心颓废、民气消沉之时,必须筹款坚持训练东北义勇军,长此以往,必能拖垮日军。由于他的坚持,东北协会仍然每月援助义勇军3000元。8月5日,东北协会上海总会决定停止援助义勇军。此后黄恒浩仍然设法对义勇军给予支援。1933年12月24日,他派人给李春光、任福祥、邓铁梅、马俊山部送去费用,同时经费还给予李春润、邓铁梅的眷属。为解决军械问题,1934年5月26日,东北协会还介绍邓铁梅部、任福祥部代表到北平向专家刘惠民学习制作炸药方法。1934年8月31日,他抚恤李春润1000元,汇给哈尔滨宫邦杰1000元。<sup>[117]</sup>但是,1934年10月,北平分会的经费削减到每月2000元,支援义勇军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何梅协定》签订后,东北协会北平分会也被迫解体,这宣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需外援的中断。

## 五、全国各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援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除了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和民众支持外,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中国青年党等各方都对义勇军有经济上的援助。

### (一) 中国共产党给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从国家和民族立场出发,及时发表抗日宣言,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动员作用。救国会成立初期,中共派出党员干部全力支持,同时先后派遣200余名党、团员到各路义勇军中工作,组织和联络义勇军,或独立组建抗日武装,以实际行动支持义勇军抗战。

中共中央还积极号召苏区军民进行募捐。1933年5月,苏区互济会号召苏区人民对义勇军捐款捐物。在中共积极宣传下,苏区军民热烈响应,如瑞金壬田区禾丰乡、瑞金县黄柏区蓝田乡、上坡乡等开群众大会时,群众纷纷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红军战士尽管贫穷,但为了战场上与日军奋战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仍然倾其所有。据统计,送到互济会来的款项,“计有一军团一百三十七元七角;三军团一百五十五元九角四分,各兵站七十七元零二分;方面军直属队二百一十元三角。”<sup>[14]</sup>同时福建军区一分院总计募捐164.8元。此外,石城兵站医院在“五九”纪念日,赣县山溪区在纪念“五卅”大会上都号召民众积极进行募捐。苏区军民的捐助虽然并不丰厚,但这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义勇军无限的钦佩和热爱,希望尽其所能支援义勇军。

### (二) 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的是一种非公开化的抗日政策,暗中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经济上是有所援助的。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东北党务机关、抗日救亡团体等不同途径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支援。

河北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平绥路特别党部等华北四党部联合发起扩大募捐运动,将募集到的款项接济东北抗日义勇军棉衣及子弹,以资长期抵抗,得复失地。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1931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对马部多次发电报奖勉,援助马占山5万元。宋美龄特发起妇女慰劳将士会,筹募捐款,她本人首捐洋1万元。<sup>[12]</sup><sup>59</sup>

国民政府通过支持救国会、后援会和东北协会这些抗日团体间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支援。在救国会委员中,有国民党CC派、国民党改组派成员,如梅佛光、钱公来、黄恒浩等人。南京政府还支持

朱庆澜组织的后援会,由上海兵工厂援助朱庆澜步兵子弹 200 万发、手榴弹 3 万枚、机关枪 48 挺、迫击炮 20 门及子弹 1 万发。

国民政府机关东北四省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还接见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 给予援助。唐聚五军事受挫后,蒋介石曾在保定召见他,唐在北平期间国民党每月给予活动费 20 万元。<sup>[13]</sup>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和援助的还有东满地区吴义成领导的义勇军;东边道地区玉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东三角地区邓铁梅领导的义勇军;北满有双龙、张禹亭所领导的东北光复联合军、中国革命军和东北军;吉林地区三江好领导的救国军;东边道赵同、白君实所率领的东北少年铁血军;在奉天、吉林地区游动的由崔荣山领导的铁血救国军等。当吉、黑部分东北义勇军弹尽援绝时,1932 年底被迫进入苏联境内。马占山、苏炳文部退入苏境后,国民政府汇 30 万元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1933 年,经国民政府与苏联交涉,东北抗日义勇军分期进入新疆境内,费用由国民政府承担。

### (三) 中国青年党的经费援助

1923 年,曾琦、李璜等人以国家主义相号召,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青年党。该党主张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很快发展成为国内仅次于国民党、共产党的第三大党。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提出停止党争,共赴国难,组织抗日活动。李璜专门组建义勇军和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他在上海等地共筹款 14 万元,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原张学良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王捷侠为总司令,原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王慎庐和王师曾为副司令。

青年党以经费赞助义勇军抗日。王捷侠被资助 2 万元,亲率 120 余人的队伍去热河滦平,以便与马占山部失散的队伍联络起来。王慎庐被资助 10 万元,携带一部分武器弹药,在热河遵化县组织司令部,率领百余名东北讲武堂学生前往东北。对于这些出关参加义勇军的人员,奖励每人 500 元。为鼓励和资助东北义勇军抗日,王慎庐规定:每打翻敌人火车一次,奖励大洋 5000;杀死敌人军官一个,奖励大洋 500。<sup>[15]</sup>这个奖励措施在初期确实有效,在青纱帐起时伏击于北宁、南满与新民几条铁路附近,攻击日军,让日军颇为头痛。然而,由于受日军的封锁围剿,许多义勇军队伍化整为零,并不容易联络,王只联系上一些零星的绿武装。

为进行长期抗战,青年党组织东北学生救国军出关抗日。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率领 6 人自愿前往,李璜将藏有 100 张银行本票共 1 万元的夹背心赠予苗可秀。苗可秀不负众望,在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担任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培养 300 多名军官,并在邓铁梅牺牲后,组建中国少年铁血军继续与日军作战,最后壮烈殉国,为青年党之骄傲。

### 结语

东北抗日义勇军军需经费主要依靠自身、外界援助和战斗缴获三个途径获取,从而使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战初期同日伪军作战中取得了一次次辉煌的战绩。随着日本在东北不断增强兵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游击区各个封锁、集中围剿,义勇军发展陷入低潮。军需无法保证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东北抗日义勇军初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援助,但是在这种多方援助中却存在一些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第一,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都往东北抗日义勇军派有各自的敌后工作人员,所以难免各自为政。在他们争取下,东北义勇军中的“小白龙”“压满洲”等是国民党员,国民救国军的孔宪荣拥护广东政府,吴义成对国民党也抱有较大期望。义勇军首领苗可秀、耿继周等是青年党党员,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人是共产党员及其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其实,不管任何派别,都应该在外敌入侵面前抛弃党派之嫌,共同合作,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但是国民党、青年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党派之分,从而影响到对义勇军的政策及援助。如东北协会发现在某些义勇军队伍中有共产党员活动时便停止了援助计划,致使这些义勇军发展受到影响。第二,对义勇军的援助缺少一个统一机构和长远的规划。其实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马占山江桥抗战后,社会各界通过各种途径给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捐



款很多,但是实际上马占山部等得到的并不多,许多款项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送达到位。而且,由于义勇军的复杂性,一些没真正抗日的队伍往往冒领捐款,而一些急需援助的义勇军却得不到援助。援助有急缓,运输有易难。所以,当时一些有志之士主张“全国组织一接济东北义勇军的总机关,一切款项的收入与接济运输办法(包含军械粮食衣物的接济)都由总机构所决定”<sup>[16]</sup>。而这个总机构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一个对义勇军援助的总体规划,从而影响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军需后勤等各方面供给,也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解体的原因之一。

#### 参考文献:

- [1]陈清晨.东北义军之考察[N].申报月刊,1932-09-15.
- [2]郭景珊.“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军民的抗日战争[M].鞍山文史资料选辑(6),1986.
- [3]许树信.中国最早的抗日货币—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J].中国金融,2005(12).
- [4]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鞍山市志·军事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
- [5]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 [6]朴宣泠.东北抗日义勇军[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
- [7]王化一.日记[Z].1932-09-09,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
- [8]马占山将军证明收到本社巧款无误[N].生活周刊,1932-08-19.
- [9]捐助马占山军慰劳金诸君公鉴[N].大公报.1932-02-11(2).
- [10]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第三次经收捐款征信录[Z].未刊稿,1934-01-01.
- [11]黄恒浩.东北义勇军四年[M].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台北:国史馆印行,1981.
- [12]蒋夫人发起马将军将士慰劳会[M].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台北:国史馆印行,1981.
- [13]辽宁省档案馆.JDI4-2-308,1934-08-11.
- [14]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N].红色中华(93-4).1933-07-11.
- [15]李璘.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义勇军(节选)[M].《传记文学》编.十四年:从1931到1945.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 [16]础砺.怎样援助东北义勇军[J].南方旬刊,1932-12-05.

#### On the Source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Anti-Japanese Volunteers in Northeast China

ZHANG Wanjie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Sanya, Hainan 572022)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Volunteers in Northeast China started spontaneously by the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source of their military suppl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we should investigate because of the volunteers rapidly develop up to more than 300,000 within a year. In the dilemma of no fixed weapons and military aid, they carried out an arduous struggle against Japan relying on self financing, capture and foreign aid.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Japan and the internal limitation of assistance, the assistance to the volunteers in Northeast China was affected, which made the military supplies of the volunteers in Northeast China unable to be guaranteed and became a factor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volunteers.

**Keywords:** Anti-Japanese Volunteers in Northeast China; Anti-Japanese Peopl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Liaoning Jilin Heilongjiang People's Support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吴祖鲲